



我所认识的敖忠先生

□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刘培轩

今年春节前几天,听说敖忠先生身体大不如前了,便给他打去电话,拜个早年。他听不明白我是谁,重复了两遍,还是没明白。他的夫人曾老师接过电话,又大声对他说,他还是不大明白。我关了手机,随即叫女儿送我去他家。

敖先生安然地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身着蓝色对襟中式防寒服,脸色红润,略胖,不像生病的样子。我握住他的手,问候他。他笑咪咪的,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又没说出来。曾老师解释道,他失聪了。我凑近他耳朵大声说“拜个早年”。他拉了一下我的手,他的手很温暖,也有力。我便和曾老师拉了几句家常,问敖先生的饮食起居等等。坐了一会儿便起身告辞。这时,敖先生突然大声问我“认不认得熊宪光、万龙生”。我愣了。一直以来,他都知道我认识的,而且还很友好。又问“认不认得姜忠学”,我急忙凑在他耳边说:“认得的、认得的。”熊先生治先秦文学,是《战国策》研究的著名专家,都带过好几届研究生了。万先生从《重庆日报》副刊部主任的岗位上退休,大力提倡格律体新诗,是重庆格律体新诗创作、理论研究的领袖哩。他频频点头,笑得很自如、很灿烂。我停顿了一下,看他再问什么。他似乎在回忆,在从回忆里搜索什么,却又没说出来。我又补充道:“姜忠学是我农场劳动时的同学,好久不见了,听说他和夫人一起进了养老院,身体很好的。”他没再说什么。我虽心有所恋,也只得告辞了。他又颤巍巍地要送我,我连忙请他坐下。曾老师送我,待我要上车时,她才哽咽着说:“敖先生才从医院回家两天,他得了一种叫‘克雅’的怪病。简单说,就是脑颅里有一种专吃脑细胞的细菌,潜伏期长,表现症状像老年痴呆。病因,无解;治疗,无药。一旦查明,时间长的至多一年,短的则一月。患这种病的概率在百万分之一。”我闻言大惊!一时竟找不到安慰曾老师的话来,只好说:“吉

人天相,敖先会闯过这一关的。”

日运月往,一月、二月、三月过去了,严冬的灰暗已成了明媚的春色。我为敖先生祈祷,但愿是误诊了吧。4月12日,曾老师来电话说:“敖先生逝世了。”悲乎,春节前拜早年成了最后的拜别!

我携家人去灵堂吊唁。曾老师告诉我一个现在才公开的“秘密”——敖先生的享年,若依户口簿是89岁,但实际是90岁。他家庭出身不好,家里为他瞒报小了1岁。他才躲脱了“戴帽子”的厄运,得以继续学业。敖先生去世的消息我没有告诉别人。因为,我实在不愿提起敖先生因得了“克雅”病去世。一般人哪知道有这种病,而且概率只有百万分之一!敖先生这样一个善良的学者偏偏就摊上了!

7月8日,万先生发帖告知敖先生去世的消息,表示哀悼。紧接着熊先生也发帖,特用了“哀恸”二字。我这才把“最后拜别”的情况告诉他们,从电话中的语调上听得出他们的感动与唏嘘。

7月10日,曾老师来电话,约16日聚会,对到灵堂吊唁的亲朋表示谢意。我因老伴骨折卧床,未能践约。这又引起了我对敖先生诸多往事的回忆。

20世纪70年代,江北区就有“18中三杰”的美誉——敖先生重在文艺理论、

文学批评及鲁迅研究,薛继洲先生和张继祥先生则分别在诗歌、儿童文学方面颇有造诣。

1974年5月,重庆教师进修学院(今重庆二师前身)恢复建制,敖先生即被调入。当时学院领导的意思,是要他做秘书兼为市教育局领导写些文稿。他婉拒了。此后,他主动提出去清理图书馆。他一人蓬头垢面,搞了半年多,才将书报杂志、各类书籍分类整理,重新按目上架。图书馆才得以开馆借阅。他任学报主编后,每天都是第一个到办公室做清洁。

敖先生做学问,不赶时髦。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门大开,域外诸多文学批评模式蜂拥而来。敖先生却依然坚持在文学社会学的沃土上深耕。有好心人劝他“跟上潮流,出点重磅”,不然会被“边沿化”。我曾问过他,对这些“点拨”怎么看。他举例说:“有一个流派叫英美新批评,其核心主张文本细读。当然也对,也有启发。但是,这种主张排除作者的生平、时代背景、社会环境等外部因素的影响,这就值得斟酌了。学习新东西,不是赶风头。而新批评的观念和方法长于其时兴起的现代主义诗歌,尤其是象征主义、意象主义诗歌的解读,若用于所有文学作品的解读,在中国恐怕会‘水土不服’。”至于“好心人”的“点拨”,他则哈哈一笑:“也是一家之言吧。”可见,他对时兴理论也是有研究的,只是坚持自己

的学问路径,不愿苟同罢了。

敖先生为人忠厚,从不在人前随意议论他人长短,还诚为他人辩白。一次,母校皮朝纲先生来重庆,敖先生做东款待,我也有幸参加。席间有人提及某某人学术行为不端,靠抄袭发表论文。敖先生当即说了几句足斤足两的话。他说:“两篇论文我都找来读过。只是个别观点相同,阐述时有个别段落的文字相近。谈不上是抄袭。这种情况,文坛上并不少见。为什么偏就以某某人抄袭来炒作呢?文人相轻也不要随意攻讦为好。”后来,我碰到这个被攻讦的人,说起敖先生为他辩白的事,他还不知道呢。前几年敖先生视力急剧下降,医生告诫他必须“立即搁笔”,否则会导致失明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依旧不负诗人殷白临终前的嘱托,为之编纂文集付梓。

敖先生爱护文学青年,常为素未谋面的年轻人改稿、荐稿。某年,城口县一文学青年寄给他一篇读茅盾《子夜》的文章,他看后觉得文章散漫不足取,但又想到这个人地处僻隅,写一篇文章寄来也应鼓励。于是,他把文章修改后寄回,谦逊地请这个青年谈谈可否,这个年轻人十分感动。世界那么大,事竟这般巧,我到城口出差,接待我的正是这个青年。敖先生退休后,《重庆社会科学》杂志编辑部请他作特约审稿人,他依旧为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改稿荐稿。

历史的剖面

□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陈泰湧

400多米,即到川益小学,小学校门内右侧有一间小小的校史馆,面积很小,却精心展陈了重庆这座城市100多年的发展史。没错,这是一所小学校的校史馆,讲述的却是重庆城的发展。

长江南岸的这一平坦地块,很早以前就以居住在此的苏家姓氏为地名,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在此处设立铜元局铸币,该地即以“铜元局”成名,尽管在历史的洪流中,清政府所设立的铜元局先后被民国政府的“兵工署第二十工厂”和1949年后的“长江电工厂”所更替,一个厂名更替,但老百姓还是把这里叫作铜元局。

终于,长江电工厂搬迁到了茶园,“苏家坝”的名字穿回到了新建的立交桥上,没有了大厂的铜元局进入了以楼盘命名的阶段,老百姓把这里喊作“融侨半岛”。校史馆的展览墙上留下了风光无限的未来。南岸区文联主席赵瑜从小就生活在铜元局,就是在川益小学读的书,她对校史娓娓道来:“1924年,在军阀混战的动荡年代,重庆长江岸边,铜元局老君庙里的4间草房里,一间学校应时而生,取名‘觉民’……”

她说:“川益小学最著名的校友就是红岩英烈郑寄松,他是川益小学的第一届毕业生,后来是第二十兵工厂写字科的缮写工人,1949年11月27日夜牺牲在渣滓洞监狱,那一年他年仅29岁。”

校史馆的墙上有一幅郑寄松的肖像,我看着那幅肖像,他的眼睛也深邃地看着我们。

同行的曾绍仑退休前曾任长江电工厂集团公司党委宣传部部长,他介绍说,为了给川汉铁路筹款,光绪皇帝御批在重庆设立铜元局“制币厂”,共筹银200余万两,征地200亩,买回英制德制设备各一套,自此开启了这百年沧桑坎坷的历史序幕。“铜元局设厂却没造出清铜币。”曾绍仑卖了个关子,然后才不紧不慢地为我们揭露出一个秘密,“时局动荡,铜元局的铸币一再推迟,并没为川汉铁路提供资金,而川汉铁路公司其他股金被当局大量挪作它用,股民的不满最终导致了保路运动、武昌起义和辛亥革命的爆发……看,这就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事件,而我们现在就站在‘历史’之中。”

我们站在城市观景阳台上,也有来打卡的年轻人,他们更多的是眺望远处的渝中胜景,那是一幅画,气势恢宏、岁月静好。而曾在铜元局生活过的赵瑜和曾绍仑,他们在俯瞰和争论,他们在回忆着视野左下方保留着的两栋上个世纪70年代的房屋,那是粮店还是邮电所?他们的争论不是因为记忆的模糊,而是因为周边的参照物都已渐渐消失。

在他们争论的房屋旁边就是一片庞大的拆迁工地,扒掉了这百多年来覆盖在它上面的建筑,裸露出了黄色的泥土。

我们一直以为历史只存在于博物馆或者教科书中,谁能想到,宏大的历史就这样和我们轻轻地相遇,就在我们的脚下。

我们所看到的立交桥不只是桥,我们所站的观景阳台不只是阳台,它们是历史叠压的剖面。



融侨立交

一个地方的历史,有时不是写在碑上,而是藏在路的转弯处。重庆的转转立交,就是这样一个个神奇的地方。《疯狂的石头》片尾呈现的黄渤在转转立交桥上疯跑的场景让故事在捧腹大笑之中余味悠长。

转转立交桥的官方命名叫融侨立交,是全国罕见的一座全方位720°旋转立交,主体结构形似三层转盘。回到现实中,转转立交桥与重庆的其他网红打卡地相比就冷清得多,桥上没有人行道,只能是驾车通行,且位置又隐藏在铜元局片区的深处,一般游客少有到达。

在重庆,一说到桥、隧,往往都能轻松地在前面冠以一个“全国罕见”或“全国第一”,就在距离融侨立交1公里左右,就是一座“全国城市最高的匝道桥”,官方命名叫苏家坝立交,整个桥高72米,连接菜园坝大桥的北桥头。苏家坝立交桥以其独特的螺旋造型和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城市景观,同样成为多部影视作品的取景地,比如电影《火锅英雄》展现了立交桥下的蜿蜒阶梯,电影《少年的你》中主角小北

和陈念的居住地也位于苏家坝立交桥上。但也有同样的遗憾,这个立交桥是只通车,行人止步。

2022年,一条长300米、高差近50米的苏家坝步道建成投用,顺手还搭了个观景台,游客可70度俯瞰苏家坝立交、菜园坝长江大桥及渝中半岛风光,这个有着绝佳视角的观景平台以“铜元之光”城市阳台为名。

2025年央视春晚重庆分会场开场歌舞《如意舞步》就在“铜元之光”展开,该地标作为重庆分会场核心场景出镜,展现了山城桥景、城景与车流交相辉映,车流在脚下绕了三圈,远处的渝中半岛亮得像一块烙铁。

此后游客纷至沓来,每到夜晚,“铜元之光”附近的公路边就停满了旅游大巴。

“苏家坝”和“铜元局”这两个迥然不同的地名也就这样神奇地相互纠缠在一起,在游客的心中添了迷团。其实这两个名字很多重庆本地人也分不清,要分清,那就得将重庆的近代史也顺便捋一遍。

从菜园坝长江大桥南桥头往右行